

田珍颖 著

人物 纪念册

纪念我在写作他们的有限时间里，
所获得的无限有纪念意义的感受。

作家出版社



人物

纪念册

田珍颖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物纪念册 / 田珍颖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063-9432-1

I. ①人… II. ①田…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0865 号

人物纪念册

作 者: 田珍颖

责任编辑: 袁艺方

装帧设计: 丁奔亮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400 千

印 张: 28.5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432-1

定 价: 4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纪实文学的人物塑造”三人论

论 者：

阎 纲（评论家 《中国文化报》原副总编，兼写评论、散文和杂文）

李炳银（评论家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报告文学》杂志主编）

丁晓原（评论家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

田珍颖（本书作者）

主持人：

一本书的序，可以就书论书，也可以伸张理念。本书采取后者。

本书所选作品，是写人物单篇的纪实文学。所以，请三位评论家以“纪实文学的人物塑造”为题，展开评论。

首先，请谈谈人物塑造在纪实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

丁晓原：

人物是叙事文学最为重要的元素，同样也是报告文学的基本构件。曾有一个时期，报告文学创作中有一种淡化人物，甚至放弃人物的倾向，尤其是一些集纳全景式作品，网罗诸事，纠合百态，常常见事不见人。这一方面使报告文学创作丢失了本体应有的体性，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越俎代庖，负荷超重，使报告文学创作陷入一种不自在的境地。虽然常闻轰动，然而它却是一种短期效应。与小说可以依据典型化原则对人物做虚构处理不同，报告文学只能选择真实的人物，根据实际写作的需要，取其自身存在的重要部分加以呈示。因此对于生活中有写作价值的人物的发现、选择和再现，是报告文学

写作中的重要环节。发现、选择，显现着作者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而再现，则反映了作者的艺术能力。作者要善于从时代的高度和人性的尺度观照对象，取事选人，同时又能从强化作品表现力的角度艺术地再现人物。这样既使人物具有丰富的时代内容、历史意义，同时又使作品更具艺术的形神，由此使报告与文学融为一体，真正成为文学范畴中的独特一体。在对人物的具体表现上，作者要注重做特质化、性格化的再现。

李炳银：

在我的印象里，中国式的灾难文学，尤其是报告文学，似乎更关注群体的显性行为。

汶川大地震过后，相关文学作品成千上万，而以中短篇报告文学胜出的青年作家李春雷不足4000字的短篇报告文学《夜宿棚花村》，无疑是特别获得好评的一篇。他没有写山崩地裂的大场面，没有写抢险救灾的众英雄，而是把视角瞄向了一个小山村，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切入点很小，很独特。用一个普通妇女在面临巨大灾难后对生活的认真，折射全川，用文学温静、细腻的笔法写出灾民从无序到有序、由慌乱到镇静，进而逐渐走出灾难、走向阳光的过程，其艺术价值有别那些正面普泛报告、翔实叙述说教的长篇报告文学。

文学说到底也是人学。短篇报告文学以重大的社会新闻事件为背景，展现给读者的是活生生的贴近生活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那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融入了作者的情感和思考，融入了作者对生活、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并用“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发现普通事物中的闪光点、文学地捕捉闪光点、艺术地报告闪光点，让报告文学的写实魅力，在浓烈的审美鉴赏中凸显一种精神震撼力。作者要深谙写作中的“大”与“小”的辩证关系，从大处着眼、小处切入，艺术而巧妙地以小喻大，收到见微知著、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

主持人：我们由纪实文学中的人物塑造的重要性，再扩延开来，谈谈传记文学中的人物塑造。近年来，传记文学创作之兴盛，是纪实文学大门类中不可忽视的。

阎 纲：

不论是报告文学还是传记文学，都归于纪实文学，有两句话不得不说：一、纪实文学的大忌在讳——为权者讳，为上者讳，为尊者讳，为名者讳，

甚至为贿者讳，假“国情”之名为家丑讳；二、纪实文学的悲剧在于鬼使神差的颂圣文化。韩愈说：“不平则鸣”，又说：“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百姓希望“明君”救社稷，“一句顶一万句”，殊不知，殷鉴不远，“颂圣文化”和文字狱联袂以往，其与封建专制俱荣而偕亡。

大转折时代，众声喧哗，兴国之道蜂起，只要作家真正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深入生活、深入灵魂，就一定深有同感或者心生疑虑，除非你看到的一切十全十美。陆九渊说得好：“为学者无不疑，疑则有进。”不去洞察舆情，不敢坚守自己的发现，不敢独立创作、自主创新，把主体的批判与社会批判结合起来，把道德批判与历史批判结合起来，安于“舆论一律”，好好好，一切皆好，人云亦云，怎么保险怎么来，所剩的那一点“艺术家的勇气”（恩格斯），不是远逊于当今独立思考的亿万网民们么！

社会永远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内心冲突中亮起灯火，在发现与创造的博弈中曲折前进，居安思危恰恰是纪实文学文体的强势所在，哪怕冒点风险。

原来的纪实文学，集中写一件、几件事，一个人、几个人，现在大兴“全景式”的制作之风，不少“遵命”报告，事无巨细，好话多说，最后变味了，变成“信息注水”“资料汇编”“流水账”。精品少了，无冲突论抬头，越拉越长，纪实文学正面临又一次的“文艺复兴”。

毛泽东的这句话说得好：“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强化纪实文学内涵思想的文学性，就是强化纪实文学的艺术感染力，保卫纪实文学不被狭隘的功利和钱袋所异化。

从《史记》到唐宋八大家，群星闪烁，我国是一个传记文学大国，很值得骄傲。思想解放以来，现历史真相，还真人真面，传记文学光彩照人。

传记文学以史为骨、以诗为肉，是史的诗、诗的史，是以私史为经、国史为纬、亲历为鉴的心路历程，素有“礼失而求诸野”的美誉。一个人反映一个时代，传记就是史记。

在一个民族的文学中，传记文学的地位是很高的，未尝不能知兴亡、辨真伪，以至于呼声很高的作品往往因犯忌而息声。传记文学的写作遇到了障碍。

我深感传记文学的写作有三个难点亟待突破：

第一，人和史的关系。尊重传主，忠于历史，以人修史，以史论人；以

历史的批判精神审视个人的生命流程，以个人的秘史叩问民族的信史；融入作家的感悟和判断，洋溢着主体的智慧和才情。基于史，发乎情，述而作，臻于文，不容大话戏说，才称得上是传记文学。

信仰不同、视角不同、尺度不同，判断也会不同。沧海桑田、瞬息万变，往事如烟人事非，传主的遭逢与心境他自己未必穷尽其妙。作家可以合理地想象，通过各种实证进行百家争鸣式的探索 and 发现，揣度传主的形状和心理，尽管传记文学体裁本身赋予作家的艺术想象空间极其有限。传记文学作品里不但有人、有史，而且有“我”。

庸史纪事，良史诛意，“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历史的内容”要求担当思想家和史学家双重使命的传记文学作家自觉担当、刻骨铭心。

第二，传主和作者的关系。平视、俯视、仰视还是跪视？

传记面前，一律平等，立传自由，各有自己的尊严和角度。不管你标榜自己如何伟大，不管你对传主如何崇敬、激情如火，但在传记文学的麾下一概接受现实和历史的检验。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必须如实道来，依其对人民的态度以及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大胆立言，“我注六经”同时“六经注我”，重铸一个或许不完全被世俗认同的真“魂”。文学的高度是美学和历史。

第三，纪实作品之大忌在“讳”，各种各样的讳，讳疾忌医。作者经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实证研究和理性思考，十分明确人物的是非曲直和历史价值，然而，在“国情”之于“稳定”的面前步履维艰，怕犯讳，造成“真”的缺失。作家要么是不明就里，褒贬失当，要么是心里明白，笔下打哆嗦。

李炳银：

近几十年来，伴随着政治上的巨大变革和思想上的解放脚步，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思想文化环境也出现了很大的进步变化。过去，对于领袖人物的个人写作几乎是无法进行，对于领袖人物的情感生活给予关注描写更是禁区的情形，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必须指出，对于历史人物的所有精神或情感的表现，任何的解析判断必须要还原历史的环境和人物的特殊生活行动，绝不能简单粗暴地用自己或者后来者的私识与现今的感觉轻易地臧否历史人物。更不可以以政治情绪化的态度歪曲和亵污本来是高尚纯洁，即使是因特殊复杂环境带有某些瑕疵的历

史对象。

主持人：

纪实文学中人物的塑造，并不仅仅是个技巧问题，各位读过不少报告文学作品，从理论上，可为纪实文学的人物塑造做出指导。再请三位就纪实文学如何塑造人物，发表高见。

丁晓原：

报告文学文本的叙事性，是其作为叙事文学样式的重要命意。故事的主体是人物。关于报告文学的人物表现，我想起英国小说理论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将人物分为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报告文学虽异于小说，但于此却是相通的。报告文学叙写的人物应当是圆形的，因为生活中的人物本身是圆形的，圆形人物比扁形人物，形象更丰满，意涵更丰富，更具审美功能。圆形人物，其性格并不只有单一的一面，而是有着主导面的多维性格的组合。报告文学的人物叙写也要像小说的人物塑造一样，去“扁平人物”，求“圆形人物”，既写出人物性格主导的一面，也要写出其多面的、变化的特点，写出人物本有的故事性。写人，贵在求真。画其形，易；求其神，难；言人长，易；道人短，难。示人本貌，兼备形神，见其人性，这是报告文学人物表现的高境界。长期以来，正面人物报告文学片面地求取人物的高大全，使作品几近简单的好人好事表扬稿。这种做法，导致人物的严重失真，违背了报告文学创作必须恪守的第一原则——真实，也易使读者对人物产生反感，影响作品叙事功能的实现。

李炳银：

对于爱国情愫的赞赏，对于科学目标的追求，对于困厄的见证和抗争，对于文明的渴望等，这些似乎是一个古老传统的文学主题。可是，在中国的社会生活经历了长期的极“左”思想禁锢和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十年浩劫灾难的情况下，本该跨越更新的主题，却必须从这些传统基本的地方重新开始。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报告文学，正是在中国社会处于“拨乱反正”的时期，率先表达这些传统正义文明精神和行为主题而得到人们广泛接受和肯定的。当1976年10月的春雷震响之后，伴随着中国大地的复苏，徐迟说自己“似乎已经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突然就出现了激情潮涌的时刻。他首先撰写了欣赏和赞美地质学家李四光以自己的独特认识理论推

进中国地质学发展情形的《地质之光》，表现出炽热的科学情怀。但是，对于像李四光这样一直处于相对平衡和被护佑位置上的人物来说，其生活和经历是不足以显示出社会的深刻矛盾与动荡的。而到了写《哥德巴赫猜想》的时候，徐迟对于科学的情怀明显地带有一种痛憾、愤怒、拯救和激情推动的自觉力量。特别是对陈景润在处于“文化大革命”那样是非颠倒、社会生活严重动乱的环境，却绝不放弃科学追求攀登的精神，并获得令世人瞩目的高端成果，徐迟给予了非常真诚和隆重的夸赞，将很多足以诱惑、摇动、激励和靠近科学追求热情的词汇，都通过对陈景润的赞美描述了出来。什么“白专道路典型”，什么“臭老九”，什么“伪科学”，什么“寄生虫”等莫须有的“帽子”，都统统见鬼去吧！陈景润是拼死要探取数学皇冠上的珍珠的攀登勇士，是不顾一切投身科学追求的无畏典型，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陈景润“一身清白。白得像一只仙鹤。鹤羽上污点沾不上去。”倒是那个给他泼了一身脏水的动乱社会环境和很多无知丑陋的人们才是一些病入膏肓的对象。严厉的社会批判和大胆的事实颠倒与更正，是《哥德巴赫猜想》以陈景润为典型对象，勇敢和诗情文学地、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有力针砭和纠正。正是在积极地介入社会矛盾，并在矛盾的文学展露中明晰和真诚诗意地表现出自我正确倾向与主张的行动，使《哥德巴赫猜想》获得巨大成功。《哥德巴赫猜想》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中国报告文学的经典。徐迟也因此成为当时最受社会瞩目的作家之一。

阎 纲：

“为生者立传”也好，“为死者立传”也好，死了的、活着的，都写，都试图“盖棺论定”。

这使我想起鲁迅，仅仅一篇短短的《范爱农》，极省俭地为一波三折的悲剧命运画了像，也为一代悲欣交集的知识分子立了传。特别是“自杀”后族人争夺捐款的一笔，穿透世态，寒彻心骨。鲁迅一生主张“立人”，为了“立人”而为人“立传”，而且很短。

鲁迅写刘半农，囊括其今生一世，怎么由“革命者”转而为“无聊文人”，“盖棺论定”，总是投以历史的眼光：“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更憎恶“将他先前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这正好应了先贤们的诗训：“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莫道古人多玉碎，盖

棺定论未嫌迟。”

然“盖棺”未必“论定”。鲁迅说过：“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

时代精神在曲折中发展，人性本质在颠沛中起伏。人的认识由片面而全面，永无止境，“立论”必须经受历史的检验。传记作者对传主的认识只能是阶段性的，只具有相对性的褒贬度。不站在现代理性的高度，不消除历史虚无主义，争论喋喋不休，永远扯不清。

寄语“为生者立传”的倡导者：“为生者”“为死者”各有其优势和局限，两条腿走路，才能轰轰烈烈。“庸史纪事，良史诛意”，良史、信史，有待于来日、后世连续不断地修订或改写，以便让传主的灵魂尽可能出壳，历史的真貌进一步显现。

请看胡耀邦1976年3月19日写长信回复郭小川儿子郭小林的一段话：

仔细地看了中组部对你爸爸的丧事安排报告和悼词全文。……悼词是不是还可以多写一些话，是不是还可以评价再高些？这当然是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我认为，问题不在于这里。问题在于：革命队伍中，对一个人，生前往往有这样那样的鉴定，死后往往有这样那样的评论，有时对了，有时错了，有时高了，有时低了，可靠吗？可信吗？又可靠可信，又不可靠可信，因为鉴定评论终归要人民、要群众、要后代子孙来做，人民、群众、子孙并不记得什么鉴定和悼词，记得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史实。……假若你们要组织上给你们再做个好悼词，当作一个传家宝，那对你们来说，就可能转化为包袱了。如果我误会了你的意思，说得不对，那就请你原谅，我是出于一片好心的。

敬爱的耀邦同志，您追溯动荡的往事，平反冤假错案，将人的评价置于历史的长河，即便“盖棺”也留有余地，感人至深啊！

李炳银：

捕捉真实独特的个性语言和细节，是报告文学描绘人物最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所以，报告文学作家，在开始采访的时候，就需要留心观察，需要仔细地体会收集这些真实对象身上那些不同于他人的东西。而细节的表现，是所有文艺作品最富有血肉和质感的内容。细节可以是人的标志和符号，也足

以成为人物性格命运的标记。如“武松打虎”、“诸葛亮借东风”、“黛玉葬花”等故事细节，就是以个性的细节成就了人物的形象，表达出人物的精神性格和情感内容。所以，报告文学要有发现的眼光，要十分注意细节故事的收集，才好将人物文学式地表现出来。

丁晓原：

细节是叙事作品艺术生命的细胞，没有细节的描写，就没有真正的叙事文学。作家最起码的艺术功夫就是善于用细节来说话；文学作品最起码的形象思维就是以细节进行思维。运用细节表现人物，不仅可以防止淡化报告文学的形象性，更主要的还在于有益于增强人物形象的真实感、立体感，从而强化艺术形象的感染力。由于报告文学写作的独特性，不能像小说那样可以虚拟符合艺术真实规律的生活细节，作家必须保证作品所写的内容，包括细节，具有严格的生活真实性，因此，作家没有创造细节的自由，只有运用非虚构叙事艺术的眼光去选择生活中有质量的细节。

阎 纲：

再不要把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搅在一起了。

二者确有共通的地方，比如说严格恪守高度真实的写作原则，这一点肯定无疑，但是，二者有区别，区别在于报告文学是新闻的衍生物，重事件，以写事为主，如时下社会的热点痛点、世态的炎凉冷暖、迫切的时代精神等等（当然，事在人为）。传记文学是历史的衍生物，着重写人，写人的历史，人的心灵史，人的私密（当然，私密放料是有限度的，特别是活着的人，又特别是活人的晚节和性爱婚变。经后人发掘考证，立传人隐恶扬善者岂在少数？）。

报告文学是现代社会出现的新文体。50年代中期，苏联冰河解冻，以“干预生活”为社会热点命名的“特写”（也是新闻特写衍生物）的新文体震惊世界文坛。

有人问：人家已经收听到快捷的新闻，为什么还要你写报告文学呢？是不是因为新闻还不透明？新闻透明以后报告文学是否继续存在？还存在，老九不能走！理由有三：信息量更大，主体意识更强，开掘更深，笔下生花常带感情。不然，在突发事件天下瞬息可闻的信息时代，哪有报告文学立足之地？

传记文学就不同了，固然在真实性方面也有极严格的要求，但是不强求

时效性，不然，历史人物没法写了。传记文学重在写人，写人的心灵史，把人的私史和社会历史结合起来，把史和文相糅合，文质彬彬，这个太重要了。王蒙说他写《王蒙自传》是“化私人机密为国家日记”，有意思！

李炳银：

报告文学是被划在了文学的范围内，自然是在它新闻的真实性和社会性之外，同样需要有人物命运及形象性格的描写。只是这样的描写要尊重真实的对象事实，不能够像小说、戏剧家那样虚构罢了。有人怀疑，不能够拥有虚构的手段，就不可能实现人物的性格命运描述的生动与文学化。这是一种固化和主观性的认识理解。“真实是文艺最上等的原料”，在有作为和具有高超的文学把控能力的作家手里，事实的真实对象，经过作家艺术的结构、叙述、处理、描绘等手法处理，时常会产生更加真实强烈的感染力量。徐迟笔下的陈景润、黄宗英笔下的徐凤翔，等等，都是在真实社会生活环境和基础上书写出的个性鲜明、命运感很强的人物形象，其包含的内容，一点也不输于很多通过虚构方式书写的人物。所以，将虚构与文学艺术性简单等同的认识是错误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类的作品是可以也应该在人物形象命运性格描写的过程中寻找到自己的特殊途径。

主持人：

研究“纪实文学的人物塑造”，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促进纪实文学更上一层楼所应关注的重要问题。过去，评论界对这一点关注不够，论结构多、论思想多、论事件多，当我们专注地将纪实文学中的人物塑造的研究推进得更深更细时，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纪实文学的魅力。谢谢三位评论家。

2016年10月

目 录

CONTENTS

序：“纪实文学的人物塑造”三人论	001
------------------------	-----

第一章 怀念篇

对一位远行者的人格描述	
——纪念学界前辈费孝通百年诞辰	003
心中的一片阳光	
——忆师长	030
秋 思	
——忆祖母	043
名人费路路	065
冬天的记忆	083

第二章 锦绣篇

荒原多情	
——关于北大荒、大学生和知识价值的探讨	097
第一滴水	
——记我国第一个电视播音员沈力	134

明月行	
——记女剧作家白峰溪	147
你在百花丛中	163
一位女艺术家的是非短长	171
赵桔创业	186
生命的火	
——记一群高擎火炬的人	201
星儿故事	
——记女作家陆星儿	219

第三章 低谷篇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233
迷离青春	
——青年犯罪研究的一个课题	270
站在悬崖边的弱者	
——当代女性犯罪引出的思考	316
大墙无阻	
——北京市监狱纪实	363
被扭曲者的歧途	428
后 记	438

第一章 怀念篇

对一位远行者的人格描述

——纪念学界前辈费孝通百年诞辰

引 子

想写费孝通伯伯的心思，早已有之，但却迟迟未敢动笔。

我和费伯伯的女儿宗惠，是中学同学，我们在北京女十二中（原贝满女中）同窗六年，相近相知，又都有过年少时的政治坎坷。但我虽与宗惠相近，对费伯伯却依然敬远。因为他在我心目中太深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其学术光辉，闪耀中外，并著作等身；他也太庞大——除了许多学术头衔外，他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及民盟中央主席等令人仰视的职务，地位十分显赫。

2005年，费伯伯病重住院，我父亲亦已病危，两位老人的病房，楼层相隔，我和宗惠，又常在住院部的电梯里相遇。不久，费伯伯先，我父亲后，辞世于同一年中。那时，人的生命随风飘去的脆弱之象，令我凄痛怆然，长久难以平复。

今年，到了费伯伯百年诞辰之时，我有了提笔的冲动，不是我对他有了精深的研究和了解，而是我想以一个晚辈的心意，书写我对他的景仰，哪怕只写到他一生中的某个片段。

为了阅读的习惯，我在下文中将改称费伯伯为“费孝通”“费先生”或“费老”。

时间的玄机

1957年，时间没有在这里停顿，但它受到了巨大的震荡——这一年，中国的历史上，被重笔写下了四个字——“反右运动”。

在“反右运动”中，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被划为